

■独家调查

村里的地，
明天谁来种

▼编者按

时下，“未来的地谁来种”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这个话题暂时没有答案，但亟需得到答案。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指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对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已更为紧迫。

回答“谁来种地”这个问题虽然很难，但应该尝试。春节期间，《烟台新闻》的记者分赴家乡，深入基层，选取了分布在胶东和鲁西南的四个典型村庄，寻找当地最年轻的农民。他们有的住在城郊，有的处在群山里；有的是苹果大户，有的以种菜为生；有的对土地充满眷恋，有的梦想外出闯荡。虽然各有不同，但在这些“最年轻农民”的身上，总会有一些值得启发的共同点，希望通过对他们的了解，能够发现一点未来农民的所想所需，为回答“谁来种地”这个问题带来帮助。

比起种地，
更想出去闯

□ 本报记者 杜晓妮

崔相杰，29岁，蓬莱市大辛店镇杜家村农民

“小枝闹洋洋，大枝亮堂堂，通风又透光，必定有产量。”2月8日，走完亲戚的崔相杰正在自家的果园学习修剪果树的技巧，“我已经干了10多年农活，但还是不能掌握种植果树的技巧。”

今年29岁的崔相杰是蓬莱市大辛店镇杜家村最年轻的农民，在同龄人还在玩闹的时候，他便跟随父母开始跟土地打交道。崔相杰一家三口的经济来源是15亩土地，其中有10亩是果树，剩下的5亩地种的是粮食。

“一年四季都有忙不完的农活，除了要种好玉米、花生和麦子，还要给果树浇水、施肥、打农药、套袋、摘袋等，尤其是秋天苹果成熟的季节，由于时间紧迫，忙起来连饭都吃不上。”崔相杰想起去年的农忙时节告诉记者，“早上6点去果园摘苹果到晚上6点，然后再将一天的苹果进行分类，要忙到晚上10点多。第二天凌晨4点多起床卖苹果，平均一天要卖3000多斤，最多一天卖了近一万元。”

在大辛店镇，杜家村只是一个村庄，一共有80户196人，土地550亩。但整个村庄种地农民的年龄结构却让人担忧。据杜家村会计杜法介绍，村里60岁以上有32人，40—50岁有60多人，而真正参与务农的只有60多人，多在50岁左右。“现在村里种地的人越来越少，10年以后村里的土地谁来种还是个问题。”

如今在杜家村，劳动力缺乏已经十分明显，杜兆海兄弟俩种了40亩土地，是村里的种地“大户”。“两个人种40亩土地还是有些吃力，他们72岁的老父亲也会帮忙，现在农忙时节60多岁的老人都会帮子女干农活，减轻负担。”杜法说。

农民的经济来源靠土地，受自然条件影响非常大。随着化肥、反光膜、农药等价格的提升，果园的种植成本也水涨船高。“前年风调雨顺，15亩土地带来毛收入近15万元。去年，雨水太多，果树普遍减产，毛收入不到10万元。”崔相杰告诉记者。

崔相杰虽然是杜家村最年轻的农民，但种地并不是他自己的选择。“比起种地，我更愿意出去打工，去外面的世界闯荡一下。只是父母年岁已高，农活太多忙不过来。”崔相杰说，“我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走出去，不要留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很辛苦，靠天吃饭的农民挣得都是汗水钱。”

►延伸阅读

农村同样面临“用工难”

苹果“雇工”一天180元仍难觅年轻人



左图：果业局技术人员正在杨础镇文口村老果园进行更新换代示范点现场培训，前来围观的果农中不见年轻人。

□王强 任梦雪 报道



右图：春节后海阳首场招聘会，前来寻找工作的年轻人络绎不绝。

□杜晓妮 吕长兴 报道

□记者 隋翔宇 于冬亮 报道

本报烟台讯 “我去年套了6万个袋，你种了多少？”农历正月十四，栖霞市蛇窝泊镇上庄头村的冯京春坐在自家炕上，和村里的几个朋友闲聊了起来。此时，城市的白领已经上班，但农村里的年味还没有散去。春节对于农民来说，是一年当中难得的闲暇时间。在这期间，互相串门聊天就成为他们的主要活动，盘点

去年的种地收成则是聊天中的主要话题。

“我听说这周围有个村的人，套了30万个袋，光雇人就雇了4个。”冯京春告诉朋友，“现在雇人这么贵，4个人肯定花了不少钱。”一位朋友接话说。

蛇窝泊镇是苹果之都栖霞市的一个大镇，多数村民的经济来源都是苹果种植。近年来，“雇人打工”的模式逐渐在当地流行起来，并且价格水涨船高。按照去年

谁是我们村最年轻的农民？

无地可种，
今年俺干点儿啥好？

□ 本报记者 曲旭光

曲善武，45岁，莱山区莱山街道南村农民

家住莱山区莱山街道南村的曲善武今年45岁了。

“俺10来岁就跟着爹妈在生产队种地，后来赶上单干，村里给俺分了几亩地种粮食。”农历正月初六，曲善武对记者说，“种了20多年地，从最初自己的一两亩地种麦子到承包村里六亩地种樱桃，我可算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哩。”

南村共有1500人左右，而真正在村里常住的却不到千人。“年轻人都在外地读书工作，但凡出去了的都不愿意回来，村里真正种地的农民中最年轻的就是善武。”莱山街道南村村委会主任姜欣杰对记者说。

然而从今年开始，这位目前南村最年轻的种地农民却将无地可种。“我承包的地去年被征上去了。”曲善武说，“因为种的樱桃比较值钱，所以一亩地补偿了俺3.8万元，一共拿回来20来万。”

20多万元对于种地谋生的农民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用老曲的话说，他活了40多岁，还没一下子看到过这么多钱。“刚拿到钱的时候当然是开心，当天俺就‘赶’了辆面包车回来，花了四五万。”曲善武说。

可是，老曲的喜才刚上眉头，忧就跟着上了心头。“地被征了，今年俺该干点儿啥？”老曲对记者说出了他的烦心事。“今年干点儿啥”的问题从去年土地被征用开始就被老曲夫妻俩提上日程，可是直到现在他俩也没商量出个具体的结果。“俺今年才45岁，守着这20万坐吃山空肯定是不成。”曲善武说，“俺跟媳妇商量，今年拿出5万块钱来做个小买卖，在镇上开个店，你说开个啥店挣钱呢？”老曲笑着询问记者。

“俺觉得开个小饭店就行，我做菜，他掌柜。”老曲的妻子于爱珍插话说，“俺俩都没有做买卖的经验，俺感觉开饭店虽然累，但是门槛低，风险也还小点儿。可是他却想开个洗车的门脸儿，说既轻松，赚钱还多。”

与老曲一样，今年南村共有上百口人成为失地农民，年轻的农民不会种地，而原来种地的农民又失去了土地。“如何让村里的失地农民有个像样的活计，一直是我们的心中的大事，我们也在考虑用村里的征地补偿款办个企业啥的，但这个问题任重道远啊。”姜欣杰说。

想转让果园，但难找买家

□ 本报记者 于冬亮

牟悦鹏，28岁，栖霞市蛇窝泊镇牟家河西村农民

春节期间，栖霞市蛇窝泊镇牟家河西村的牟悦鹏有些愁眉不展。

他今年28岁，是留在村中种地的为数不多的年轻人之一。2010年，父母在镇上为他买了一栋二层小楼，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并且还有20多万元的贷款。“虽然花钱很多，每年还要还两三万元的房贷，但是房子地段好，可以在镇上做个小买卖，维持生计。”牟悦鹏的父亲说。

在镇上，牟悦鹏的洗车汽修生意顺利开张后渐渐有了起色，也于去年结婚生子，一切都在向着幸福的方向发展。但天有不测风云，牟悦鹏的父母先后病倒了，父亲股骨头坏死中期，丧失劳动能力；母亲肾结石，做完手术也是体弱多病。

“多亏现在有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给报销了大部分医药费，要不日子没法过下去了。”牟悦鹏说。据介绍，老一辈在村中管理果树的果农，由于常年繁重农活的劳累，几乎都有或大或小的健康问题，而他们身体一旦出现状况，高昂的医药费将导致整个家庭陷入困境。

“在农忙的季节，我很多时候都是凌晨两三点钟

背着喷雾器到果园里喷农药，就为了白天可以多点时间打理生意，而且现在我孩子很小，也需要照顾。”牟悦鹏说。据了解，牟悦鹏家中有十多亩果园，在村中算是果园比较多的家庭了，如今父亲不能下地干活，繁重的农活只能落在他身上。但是，管理果园就没有时间打理自己的生意。“不是没想过将家中的果园卖掉或者租出去，但是现在农村年轻人很少，年岁大的又管理不了那么多果园，而且现在卖果园价格特别低。所以很多时候，我的洗车、汽修铺子都是关着门的，生意也越来越差。”牟悦鹏无奈地说。

据了解，除了在处理农活和照顾生意之间忙碌，牟悦鹏还要陪父亲出去看病。时间久了，也会与父亲产生矛盾，父亲埋怨他对自己不用心，家中不了解情况的亲戚有时也会教育牟悦鹏。

村中缺少年轻人，加上老一辈果农大多有健康困扰，成为这个小山村当前发展中的两个突出问题。老一辈果农的健康问题成为压在年轻人身上的一座“大山”。“本来村里年轻人就很少，父母再病倒了，劳动力就更少了，农活全落在年轻人身上，还要照顾家人，太劳累。”面对家人的不理解，牟悦鹏感到很委屈。

对于未来，牟悦鹏希望父母身体好起来，更重要的是，希望国家更加重视农村医疗问题，多给点政策扶持。



□曲旭光 报道

▲莱山区莱山街道南村一位村民站在一小块玉米地旁，后面则是村里盖起的楼房。

►他山之石

种到何时，就看
啥时候拆迁了

□ 本报记者 郑书伟

吴德柱，47岁，济宁市兖州区南关村最年轻农民

2月3日，济宁市兖州区下了新年第一场春雨，家住鼓楼街道南关村的吴德柱来到自家屋后的菜地，掀起塑料棚，摸摸有些潮乎乎的土地，拔起一棵菠菜研究起来。再过五六天，这一棚的菠菜、蒜苗就可以收获了。“去年一冬天没下点儿雨雪，天太干了，这雨来得正好。”吴德柱说。

吴德柱今年已经47岁，家中大女儿正在读大学，小儿子也上小学六年级了，但他却是目前村里最年轻的种地农民。

“从前南关家家户都种菜，城里吃的蔬菜大部分是南关种的，现在没有几家还在捣鼓这几分地了。”吴德柱说，“我们都是从小就跟家里老人种地，那时候是种集体的地，1985年分地的时候，我还没到18岁，分了2分地，到18岁的能分到4分地。”吴德柱介绍说，“大家都是种一些常见的蔬菜，像西红柿、黄瓜、白菜、油菜，那时候没有外地菜进来，上世纪80年代的那几年，一年就能赚两千，当时工人一天工钱才一块二，种地比工人赚得还多。”

虽然种菜给南关村的村民带来了财富，但是村里现在像吴德柱这样，还在村里侍弄菜地的村民大都五六十年，四十岁以下的人要么做些小生意，要么在附近工厂务工，而年轻一代也都通过高考、当兵、打工，纷纷离开了儿时亲近的泥土。

现在，吴德柱父母、兄弟的菜地也都交给他一起种，加起来有一亩整。“就这点地，还得东跑西跑，来回倒腾。”他说，除了屋后的这半亩菜地，还有半亩分布在别的地方，要穿过一条公路才能到。吴德柱认为，人多地少也是种地人越来越少的的原因。“我们村一共有5个生产队，我在的4队就有700多人，地又少又分散，想盖温室大棚都支不开。”他说。据介绍，一个标准化温室大棚占地七八分，村民中很少有集中大块的，只能盖占地较小的简陋塑料棚，现在常种的菜还是从前那些，没再引进过新品种。

“地里这些菜忙活一年，除掉种子、化肥、农膜的成本，能赚上两万多块钱。”吴德柱说。平时地里不需要人照看的时候，他也在城里打打零工，用他的话说，不知道还能再种几年了。

由于位于兖州郊区，到区中心只有几分钟的车程，南关村从七八年前就有要拆迁的传言。“地嘛，能种一天是一天，还能种几年就看啥时候拆迁了。”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吴德柱感慨道。

【采访手记】

从烟台到济宁，有600公里的距离，两地的气候、地形、主要农作物，都各有不同，但是却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老龄化”，农村劳动力出现短缺。

在记者的老家——济宁市兖州区，越来越多的农民放下手中的锄头，选择外出打工或经营小生意。土地产出效益低于期待值，是农民“转行”的主要原因。采访中，受访农民提到他听闻的一条消息：该区小孟镇、颜店镇的农民将土地租出去，每年坐收1500元左右的租金，租出的土地统一种植小麦、玉米等农作物以及造纸所用的树木。同时表示自己由于受到土地地块小、分布分散的局限，无法建设成规模的塑料大棚种植产值更高的作物。

如何让想种地的农民有地种、种好地，让不想种地的农民手中土地不荒芜，不是一时一地的事情，而是一个长久的大命题。

同样在栖霞市蛇窝泊镇的东院头村是一个靠技术革新应对劳动力短缺的例子。该村140户村民与合作社签订协议，流转出200亩果园。经过土地平整之后，果园集中种植了新型矮化苹果品种，新品种不用套袋，可实现小型机械化操作，200亩的果园，只需要6个人管理。